

# 1949 年以來大陸學術界的 秋瑾研究綜述

鄭雲山\*・陳德和\*\*

中國近代「巾幘英雄」秋瑾殉難八十多年來，一直深受國人崇敬。為了開展海峽兩岸學術交流，茲就我們所知，將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學術界對秋瑾的研究狀況，作一綜述。疏漏、舛誤之處，尚祈讀者教正。

## 一、資料、論著的發表與出版

1949 年 10 月至 1956 年前，大陸學術界甚少論及秋瑾，這期間唯周作人（化名鶴生）在上海《亦報》發表〈秋瑾與魯迅〉一文，以及上海開明書店印行了夏衍創作於 30 年代的話劇《秋瑾傳》。1956 年起情況始有改變。這年，為紀念辛亥革命 45 周年和迎接秋瑾殉難 50 周年，范文瀾在《中國婦女》雜誌第 8 期發表〈女革命家秋瑾〉，對秋瑾作了充分肯定。接著，在 1957 年內，阿英、柯靈分別在北京《人民日報》、上海《文匯報》發表了紀念秋瑾的專文，謝獄在《史學月刊》登載〈秋瑾年譜〉（未定稿），朱耀庭編著小冊子《秋瑾》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這批文章和小冊子，雖還只一般地、粗略地勾劃了秋瑾的生平事業，且差誤常見，但它們的問世，表

\* 浙江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

\*\* 浙江省紹興市秋瑾研究會副會長

明大陸學術界已開始出現研究秋瑾的風氣。同年，中國史學會主編的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辛亥革命》（8冊）在上海出版，書中收錄了包括清政府〈浙江辦理秋瑾革命全案〉、陶成章〈浙案紀略〉在內的一批與秋瑾有關的珍貴資料。1958年，由宋慶齡題簽的《秋瑾史跡》亦在上海影印發行，該書收錄大量秋瑾本人的詩、詞、文、書信（郭沫若為此書寫序，對秋瑾作了極高評價）。兩年以後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將1949年前發行的四種秋瑾遺稿版本加以審校考訂後，出版了《秋瑾集》，把直到當時止所能蒐集到的秋瑾詩、詞、文、信等收錄無遺。以上三書，為學術界深入研究秋瑾提供了最重要的史料。之後，196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，文史資料出版社開始出版《辛亥革命回憶錄》，至1963年已出6冊，其中收錄了王時澤、徐雙韵等秋瑾生前友好的回憶材料，為研究秋瑾擴大了視野；而這年吳玉章出版的《辛亥革命》一書，則以本人親歷為主，記述了辛亥期間許多史事，其中對秋瑾的活動作了較詳記載和很高評價。此外，各地報刊雜誌也在此期間發表一批記敘或研究秋瑾的文章，據初步統計，從1957年至1962年共70幾篇。

總之，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八、九年間，大陸學術界對秋瑾的研究開始全面展開，這期間最重要的成就是蒐集、整理、出版了各種史料，為秋瑾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良好條件；而范文瀾、郭沫若、吳玉章等人對秋瑾所作的總體評價，則為進一步研究起了導向作用。但另一方面，這期間尚少有影響的專著，所發表的70幾篇文章，亦以記述某一史事者為主，缺乏較全面論述秋瑾思想、業績的論文。

不久，中國大陸進入「文革」十年動亂時期，學術領域百花凋零，秋瑾研究亦難逃池魚之殃。在整個十年中，除見於《光明日報》1973年3月6日、《四川大學學報》1974年1期、《理論與實踐》1974年2月以及《浙江日報》1975年3月18日這四篇文章外，別無任何書、文專論秋瑾者。

十年動亂結束後，以1977年紀念秋瑾殉難70周年為契機，大陸學術界對秋瑾的研究又迅速活躍，且在此後十幾年間經久不衰。與秋瑾有關的各種資料書不斷出版，諸如：浙江省政協主編的《辛亥革命回憶錄》、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等合編的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》和《續輯》、紹興市政

協主編的《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專輯》和《徐錫麟史料》，以及福建雲霄，湖南雙峰、株洲，浙江桐鄉、嘉興，山東安丘等地政協編輯、出版的有關史料書。其中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》，首次收錄秋宗章《六六私乘》等珍貴材料。此外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了秋仲英等編的《秋瑾史料》專輯；而 1985 年出版的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》第八輯，則第一次刊載日人服部繁子〈回憶秋瑾女士〉的中譯本（鄭雲山譯注）。接著，山東出版了郭延禮編的《秋瑾研究資料》，除收錄已見於國內各種報刊、書籍的材料外，還收錄少量國外的有關材料。華文出版社於 1989 年出版王去病、陳德和主編的《秋瑾文集》，對《六六私乘》詳加校勘、注釋，並首次增入〈秋壽南中舉資料〉及〈秋瑾夫家湖南王氏家世調查〉等新發現的資料。

與此同時，80 年代還出了幾本有影響的秋瑾年譜。最早的是書目文獻社 1981 年出版的孫元超主編《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譜》。接著，陳象恭《秋瑾年譜及傳記資料》、郭延禮《秋瑾年譜》相繼問世。在這之後，華文出版社又於 1990 年出版晨朵《秋瑾年表（細編）》，該書附刊了一些新發現的材料，如 1903 年起散見於《紹興白話報》、天津《大公報》、上海《女子世界》上一些與秋瑾生平活動有關的史料。

上述資料書和年譜的出版，充實了秋瑾研究的基礎，這是「文革」結束後大陸學術界在秋瑾研究方面一個重要的進展。

另一個重要進展是，「文革」結束後還有一批專著相繼問世。首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於 1980 年出版鄭雲山著《秋瑾》一書，全面論述了秋瑾一生的成長歷史及其在各個方面（唯缺少詩詞創作方面）的業績，並澄清了許多史事。1984 年，中國史學會、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聯合舉行 1949 年以來大陸首次評選優秀歷史書活動，此書榮獲「全國愛國主義優秀歷史讀物獎」。1982 年，甘肅教育學院刊印穆長青的《秋瑾評傳》，對秋瑾的簡歷、活動、思想、交友、文學創作、性格與為人等進行了逐一論述，亦澄清了一些有爭議的問題。同年和次年，郭延禮的《秋瑾詩文選》、劉玉采的《秋瑾詩詞注釋》相繼出版，對秋瑾主要的詩、詞作品，作了詳細注釋，提出不少獨到之見。後來郭延禮還出版《秋瑾文學論稿》，從多種視角分析了秋瑾詩文的特色與成就。至 1986 年，鄭雲山、陳德禾合著的《秋瑾評傳》出版，此

書對秋瑾的成長過程、革命活動、爭女權鬥爭、詩詞創作以及犧牲過程、反響等，一一作了專題評述，澄清了許多衆說紛紜的問題，並附有簡要年譜。1987年，郭長海出版《秋瑾事迹研究》；郭氏多年來對秋瑾各種史事作過深入研究，提出不少很有說服力的見解。

此外，在80年代還出版了王艾村的《秋瑾》，李茂高的《秋瑾的故事》，伍貽業與方積根的《秋瑾》，周蒂棠與謝德銑的《巾幘英雄秋瑾》，李宏生的《女英雄秋瑾》，平慧善的《秋瑾》，鄭雲山的《鑒湖女俠秋瑾》，江涓的《秋瑾少女時代的故事》等書，大都篇幅較小，或是供兒童閱讀的故事書。

## 二、各項紀念活動及學術團體的建立

1957年後，對秋瑾的各種紀念活動也開展起來。第一次大的紀念活動，於秋瑾就義50周年紀念日在她故鄉紹興舉行。這是由當時任紹興副市長和工商聯主任委員的王貺甫提議、主持的。王氏是老同盟會員、光復會員王子余的長子，他事先寫信給北京，向其表兄周恩來請示，得到周的充分支持。乃於這年7月15日上午，在紹興工人俱樂部禮堂舉行「徐錫麟秋瑾烈士殉義50周年紀念大會」。到會近千人，北京《人民畫報》特派記者採訪。次日，《紹興報》予以報導，並介紹了徐、秋二位烈士的生平。10月號《人民畫報》亦以整版刊登徐、秋照片及其故居鏡頭九幀，並刊〈紀念秋瑾〉一文。在紀念會的前一天，即7月14日，由何香凝手書「秋瑾故居」四字匾額的和暢堂，正式開放了二進（全部共有五進），展出一批秋瑾遺物。

在杭州，1957年秋瑾就義50周年紀念日，也有省、市各界婦女集會紀念。1959年春，市政府還在西湖邊原址重修風雨亭。

「文革」十年大動亂結束後，紹興市府於1979年撥款重修和暢堂，並把一至五進全部開放，較系統地展示秋瑾生平，陳列她生前用過的各種物品、許多手稿及各種其他有關文物。宋慶齡特為秋瑾故居親書題詞：「秋瑾工詩文，有『秋風秋雨愁煞人』名句，能跨馬攜槍，曾東渡日本，志在革

命，千秋萬代傳俠名。」從那時到 1992 年底，和暢堂已接待中外參觀者 50 萬人次，並於 1988 年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為紀念秋瑾而編演的各種戲劇，也在十年動亂結束後大批湧現，如浙江紹劇團的《鑾湖女俠》、北京京劇二團的《風雨千秋》、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二團的《秋風秋雨》、浙江歌舞團和杭州話劇團的《秋瑾》、江蘇昆劇團和天津京劇三團的《鑾湖女俠》等等。1982 年，在夏衍 30 年代原著，柯靈 1978 年改編的話劇《秋瑾傳》基礎上，黃宗江改編、謝晉導演、李秀明主演的電影「秋瑾」，由上海電影製片廠完成，在全國放映。

在學術研究及各項紀念活動蓬勃開展的背景下，經陳德禾等倡議、奔走，1985 年 11 月 8 日，在紹興和暢堂舉行「秋瑾誕生 110 年紀念」的當天，正式成立民間學術團體「秋瑾紀念會」，首批會員 29 人，推舉王子余之女王去病為會長。會後，秋瑾研究會經過積極準備，在 1986 年 1 月 8 日創刊《秋瑾研究》（至 1990 年 6 月出到 10 期），同日在紹興舉行了首屆學術講座。1988 年 3 月 29 日，為紀念 49 年前周恩來在紹興其姑父王子余家為表妹王去病題詞：「勿忘鑾湖女俠之遺風，望為我越東女兒爭光」，秋瑾紀念會在和暢堂舉行了「鑾湖女俠遺風」專題學術討論會。

繼紹興之後，1988 年 6 月 25 日，「杭州秋瑾研究會」亦宣告成立，亦以王去病為會長，首批會員 46 人。

1989 年 3 月 29 日至 31 日，由上述兩個研究會等發起，在紹興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性的秋瑾學術盛會「鑾湖女俠遺風學術討論會」，全國六省一市共 61 名代表與會。1991 年，上述單位又聯合發起，於 7 月 13 日至 15 日，在紹興舉行了「全國第一次秋瑾詩詞研究學術會議」，六省一市 100 多人與會。會上的論文已編成《秋瑾詩詞研究》，將作為《秋瑾研究叢書》的第三本（第一、二本即上節所述《秋瑾史集》和《秋瑾年表（細編）》）。會議期間，秋瑾祖居、紹興郊外福全山的福全中學，還成立了「少年研究秋瑾學社」，首批社員 12 人，王劍鴻為社長，秋仲英、陳德禾、金燕為學術顧問。1992 年 5 月 7 日，秋瑾研究會等又在紹興大通學堂舊址，舉行「光復軍成立 85 周年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」，會前由女會員及武術輔導教練共 10 人，身穿由晨朵設計的「愛國秋瑾裝」，表演了太極劍。

### 三、對秋瑾生平幾個主要業績的評論

在各種已發表、出版的論著和學術討論中，大陸學術界對秋瑾一生幾個主要方面的業績，看法基本一致，認為她一生的主要業績有三：第一，她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和堅定的革命者；第二，她是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；第三，她是一位傑出的女詩人。現將學術界對這三個方面的評論，作一概括的介紹。

(一) 偉大的愛國者，堅定的革命者：秋瑾曾說她自己「是個最熱心去愛國愛同胞的人」，這是她由大家閨秀轉變為革命者的根本原因。秋瑾的愛國愛同胞，首先表現在強烈的憂國憂民上，在她的詩詞、文章中，充滿「海外風波日逼人，回頭祖國更傷心」、「炎帝世系傷中絕，茫茫國恨何時雪」之類強烈的憂國意識；而這是由她處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條件，她生活的環境和家庭影響，她在北京及海外的所見所聞中受到的刺激等原因所鑄成，紮根於思想的深處，因而不會隨著自己處境的改變而淡化。相反，從少女時代直到她犧牲止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劇，她的這種憂國情緒越來越強烈，最終懷著「中原回首腸堪斷」的深沉痛楚走完了她的人生旅途。其次表現於她雖憂國憂民，但仍保持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，她強調：「大凡愛國之心，人不可不有」，從少年起她就深深熱愛自己民族的歷史、文化，為祖國悠久的歷史、燦爛的文化十分自豪，在其詩詞、文章中，常以中國歷史上有衆多英豪，尤其有秦良玉、沈雲英、梁紅玉、花木蘭等女傑而無比自豪，立誓「上繼我祖黃帝赫赫之威名兮，一洗數千數百年國史之奇羞」；她堅信中國貧困落後不是由於中國人天生不如別人，而是清朝統治所致：「我同胞賦性本完美」，清朝的黑暗統治卻猶如牢獄，中國人被「囚在這黑暗牢獄裡，把這神經遺裔盡磨銷」，因而「天道無剝而不復，吾人無困而難亨」，只要推翻清朝，中國就振興有望。

正是基於這種認識，秋瑾力主以革命推翻清朝，反對向清朝作任何妥協。她痛斥清朝統治種種深重罪惡，痛斥保皇派與假革命「都是為名利心薰黑了良心」，極其鄙視地對他們「不屑與語」，殷切希望人們做個「惟以報

祖宗的仇，光復祖宗的土地，為自己的漢人造幸福，不求虛名譽，不懼生死，不畏艱難，必要收回所失的土地」的「真革命家」。可貴的是：秋瑾自己就嚴格按此自律，對清朝毫不妥協，對革命極其堅定，直至最終為此英勇獻出一切。

在充分肯定秋瑾是偉大的愛國者和堅定的革命者時，一些學者也如實地指出秋瑾在反滿方面不適當地誇大滿漢矛盾，對民主政治觀念不甚明確，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認識不深，以及對民衆力量估計不足等缺點，但這些對於她都只能算是白璧之瑕。

(二)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：上述郭沫若1958年給《秋瑾史跡》寫的序言中說：「秋瑾不僅為民族解放運動，並為婦女解放運動，樹立了一個先覺者的典型。」而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則認為：「嚴格地說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，到秋瑾才具有實際的意義。」這些評價，代表了大陸學術界對秋瑾在爭女權鬥爭史上的傑出地位的普遍認識。秋瑾自述：「革命當自家庭始」，她正是首先從反抗封建綱常倫理對婦女的壓迫、束縛開始，走上社會，走上革命道路的。而當她留學東瀛、參加革命黨後，在從事革命活動同時，一直繼續以很大毅力和精力，從事婦女解放活動，特別是創作大量詩詞、文章，創作情詞悲壯的彈詞《精衛石》，以及回國後在滬創辦《中國女報》雜誌，通過這些，大力宣傳、號召婦女解放，提出了許多極為先進的婦女解放思想。

她把中國婦女從降臨人間直到葬身黃泉的種種苦難與屈辱，作了淋漓盡致的描述、控訴；又以「天賦人權」論為武器論證了婦女與男子天生相等，不存在孰優孰劣，尖銳抨擊了各種封建綱常倫理對婦女的歧視、束縛、壓迫。

她提出婦女應當通過學習文化、技藝，獲得謀生本領，以便從經濟上尋找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，這是很深刻的思想。

她提倡婦女們應當依靠自己的團結鬥爭來爭解放，為此就應「結團體」；特別是她提出要把《中國女報》成為「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」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到要創建全國婦女團體。

她號召婦女們參加反清革命，「恢復江山勞素手」，「男和女同心協力

方為美，四萬萬男女無分彼此焉」，從而把婦女解放與革命，與整個民族的解放有機地結合起來；而且她自己又是以身作則地照此去做。

秋瑾在婦女解放方面的活動和以上這些先進思想，大都達到了其同時代人尙不會達到的深度和廣度，她是當之無愧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。

(三)傑出的女詩人：秋瑾一生創作了大量詩詞歌聯，雖然相當部分「隨手散佚」，被捕犧牲前又主動銷毀許多，但仍有詩 123 題、斷句 8 句、詞 39 闋、聯句 2 條、歌 6 首和彈詞 1 篇傳世。秋瑾的詩詞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，表現在其詩在語言上清新、通俗、自然，既繼承古典詩學傳統，又富有創新精神，頗多古詞今用的佳句，詞匯儲量十分豐富；運用中外典故恰當、靈活；詩思廣闊，情感豐富，等等。

關於秋詩分期，一般都主張應分三個時期，亦即秋宗章〈六六私乘補遺〉所劃分的「深閨時期」、「東渡時期」、「革命時期」（具體的稱法有多種，但基本分法無區別）。對其中早期即「深閨時期」秋詩的評價，有人認為「多數是寫風花雪月，離情別緒，調子哀怨低沉，風格纖細，這類作品比較缺乏現實內容。」（郭延禮《秋瑾詩文選》前言）有人則認為秋瑾早期咏花吟草的詩詞中體現了她的「競雄」性格，「不能作為一般的風花雪月的作品去看待，而應作為秋瑾一生詩作以至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石，去加以重視。」（鄭雲山、陳德禾《秋瑾評傳》）

對於秋瑾詩詞的主要內容，一般認為可以分作「咏花明志」、「思親述懷」、「尚武愛國」、「咏史感時」和「革命贈答」等方面，其中以憂國憂民為核心的愛國主義內容，又貫徹始終，體現於極大多數詩詞之中。

#### 四、對一些具體史事的論證

大陸學術界對秋瑾生平上述三個方面的主要業績進行評價的同時，對其生平許多具體史事，也進行了熱烈討論或深入考證。主要有：

(一)討論得最多的是秋瑾究竟生於何年？秋瑾生前好友徐自華，1908 年寫《鑾湖女俠秋瑾墓表》，說秋瑾 1907 年殉難時「年僅三十有三」，照此推斷應出生於 1875 年。秋瑾的弟弟秋宗章 1934 年寫的《六六私乘》，則明

確地說秋瑾生於「光緒元年夏正十月十一日」，光緒元年即 1875 年，這與徐自華所說一致，而更具體地記明了月、日。因徐自華、秋宗章與秋瑾的關係非同一般，他們的記載具很大權威性，故其所記為人們普遍採納。但 1958 年《秋瑾史跡》問世，內附有秋瑾 1907 年被捕時的〈供詞〉，聲稱當時她「年廿九歲」，照此推斷，她應生於 1879 年。據此，《文匯報》1961 年 10 月刊載一文，斷定秋瑾生於 1879 年，二個月後，該報另有一文更以福建雲霄一位已 96 歲老人的回憶，來證明秋瑾生於 1879 年。「文革」結束後，邵雯在 1978 年 11 月《歷史研究》撰文重申此說，一時為不少人所採納，以至《辭海》「秋瑾」條，亦採生於 1879 年之說。但不久《歷史研究》1979 年 12 月公布一份材料：秋瑾與吳芝瑛 1904 年結盟的「蘭譜」，其中寫道：「秋閨瑾……年二十八歲，十月十一卯時生」。照此，則秋瑾應生於 1877 年農曆 10 月 11 日，亦即與秋宗章在《六六私乘》中所記的生月、生日完全吻合而生年卻差二年。而陶成章在《秋瑾傳》中亦記「瑾死時年三十一」，亦即陶氏也記秋瑾生於 1877 年。此後，學術界就秋瑾究竟生於 1875、1877、1879 三者中的哪一年，進行熱烈爭論，前後發表文章達 25 篇。我們在 1986 年出版的《秋瑾評傳》中，進行了反覆考證，確認秋瑾生於光緒元年 10 月 11 日，即認為秋宗章所說是完全正確的，現這已為學術界廣泛同意。

除生年之外，對於秋瑾何時初次入湘，何年與王子芳結婚，何年初上京華，何時赴日留學，是先入光復會還是先入同盟會，何時由日返國，何時回湘向王子芳之父誘款，以至哪一天就義等種種史事的具體時間，都有過爭論，目前大都已有統一的認識。

(二) 討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清軍至紹興大通學堂圍捕秋瑾等人時，秋瑾他們有否「開槍拒捕」？紹興知府貴福在逮捕秋瑾及學堂內程毅等六人後，曾張貼告示，指責秋瑾「竟敢開槍拒捕」；與秋瑾一道被捕的六人在受審時，程毅、徐頌揚、蔣繼雲、錢應仁等都說到當時學堂內有人開槍，但他們都說不清究竟是誰開的槍；貴福在給浙江巡撫等人的報告，以及浙撫張曾敘給軍機處的電報和給皇帝的奏摺中，亦都說到在圍捕時學堂內有人開槍拒捕。因此，以往人們均不懷疑秋瑾曾開槍拒捕。但《浙江學刊》1983 年第

1期刊載出「質疑」文章，從秋瑾得知清軍來紹時急忙隱藏槍彈武器，程毅、蔣繼雲等都沒有指明是秋瑾開槍拒捕，貴福等人亦只能含糊其詞地以「不知何人開槍拒捕」加罪於秋瑾等幾個方面，認為所謂「開槍拒捕」係貴福為應付社會輿論而製造的假案。我們在《秋瑾評傳》中，對此作了分析，根據當時學堂裡只有秋瑾隨身帶了一支手槍，而在清軍已包圍大通學堂時，她開槍理屬正當；清政府在早已確知秋瑾的革命真相，圍捕時又搜獲了各種「罪證」之後，亦不必借學堂內有無人開槍給秋瑾定罪；只因當時在混亂中誰也未留心是誰開了槍，才不能確指一定是秋瑾。所以，貴福給浙撫等的報告，他的〈告示〉，以及程毅等受審時說的學堂內有人開槍等記述，當不致是貴福等一手製造的假案，秋瑾開槍拒捕當屬事實。

(三)對於清紹興府檔案中〈秋瑾供詞〉的真偽，也有不同看法。主張秋瑾生年為 1879 年者的一個重要依據，就是這個〈秋瑾供詞〉。但反對「1879 年說」的人均認為這個「供詞」是偽詞。早在 1907 年 12 月版《神州女報》創刊號上，佛奴等人即已隱約指出「供詞」是紹興府刑訊陳墨芳與貴福所捏造，而隨後陶成章在〈浙案紀略〉中也指出「口供則由貴福使幕友為之」。但 1960 年出版的《秋瑾集》「編例」中，定此〈供詞〉為「秋瑾手稿」，加以主張秋瑾生於 1879 年者的引用、肯定，以至被一些人視作真品。為此，紹興晨朶在 1981 年《浙江辛亥革命研究會會刊》中撰文予以辨偽，他在 1990 年《紹興學刊》上發表〈肉身雖死性靈存〉一文，進一步指出這個〈秋瑾供詞〉不但決非秋瑾手稿，也非刑訊時的「口供實錄」。對此，目前已成大家的共識。

(四)對秋瑾「絕命詞」有無和字序的考證。1907 年 7 月 15 日秋瑾殉難後半個月，浙江巡撫張曾駁在 7 月 29 日電詢紹興知府貴福：「申報載：該匪（按即秋瑾）當堂書『秋雨秋風愁煞人』七字，有無其事？有即送核」；貴福立即覆電：「七字在山陰李令（按指李鍾嶽）手，已晉省」，這是秋瑾七字「絕命詞」之第一次出現。但 1908 年陶成章在緬甸仰光中文報紙《光華報》上開始連載的〈浙案紀略〉中，在提到這個絕命詞時，表示懷疑其有，認為是「不知係何人造作，登之報上。」為此，秋宗章在 1936 年發表於《越風》雜誌的〈大通學堂黨案〉中，肯定此七字為實有，並判斷李鍾嶽

晉省後將它呈繳浙撫存檔，辛亥浙江光復時，浙江巡撫署被焚，此七字亦付諸劫灰。此說是合理而可信的。鄭雲山於 1980 年 2 期《上海師大學報》發表的〈秋瑾史事散論〉中，以其中一節專論此事，重申其有，《新華月報》同年 7 月予以轉載，目前對此已無疑義。但這七字的字序究竟是「秋風秋雨」還是「秋雨秋風」，則沒有統一的認識。1912 年，徐自華發起在杭州西冷橋畔建立「風雨亭」，此亭之名即據秋瑾七字絕命詞。1929 年，秋瑾女兒王鑾芝主編《秋瑾女俠遺集》，亦將七字定為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。1936 年秋宗章的〈大通學堂黨案〉亦作如是說。1949 年以來大陸學界亦多數這樣寫，如 1961 年徐雙韻〈記秋瑾〉、朱贊清〈大通師範學堂〉，1979 年宋慶齡給秋瑾故居的題詞，都寫作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。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0 年 5 月所編《秋瑾集》，經過對照清政府上述檔案，認為應是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，目前已為一部分學者採納。

(五) 關於秋瑾被殺與湯壽潛是否有關的考證。陶成章在〈浙案紀略〉中說：紹興知府貴福在得到紹紳胡道南等人告密，確知秋瑾即將起義的消息後，立即到杭州向浙江巡撫張曾敷請兵赴紹，他一到杭州，「先見巨紳湯△△，△△素恨瑾，力懲貴福去之。貴福遂面稟浙撫張曾敷。曾敷使其幕友張讓山詢之△△，△△答曰：『是等人，不殺何待！』……曾敷之意乃決，遂徇貴福之請……。」辛亥杭州光復後，王金發為了反對湯壽潛任浙江新政權的都督，也提出「秋瑾被害，喧傳湯壽潛曾贊一詞，不應舉為都督。」由於陶、王均是秋瑾的革命同志，都是光復會重要骨幹，〈浙案紀略〉又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價值的書，因而，長期以來大陸學術界一般都認為：在秋瑾被害這件事上，湯壽潛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。1961 年版、1965 年版和 1979 年版的《辭海》歷史分冊，亦均作如是觀。鄭雲山在 1991 年第 1 期《近代史研究》上，發表〈湯壽潛與「秋案」關係析〉，則從各種史料證實：1. 湯、秋雖政見不同，但兩人既從無交往，更從無衝突；2. 在〈浙江辦理秋瑾革命全案〉等清朝檔案材料中，儘管十分詳盡、不厭其煩地把秋瑾革命活動被發覺，貴福到杭請兵，秋瑾被捕受審直至被殺的整個過程，可謂點滴不漏地記錄在案，但一個字也沒有提及「巨紳湯△△」，貴福與張曾敷之間在一切公私信函中亦均無一字提及此事；3. 貴福進省請兵是在 7 月 7



日（5月27日），是深夜到達杭州的，他到杭是要請兵去紹鎮壓已箭在弦上的秋瑾起義，事情如此緊急，又值深更半夜，他決無先去拜見湯壽潛徵詢其意見的道理，因為湯氏既非他的上司，也無權決定如何處置秋瑾，因而既無任何必要，也完全不應該先去徵詢他的意見。據此三點，鄭氏認為陶、王所說湯與「秋案」有關，是沒有根據的。鄭氏還進一步考證出：陶、王等人是從秋案發生後流布於浙、滬一帶的道路傳聞中形成有關湯氏與「秋案」有涉的印象。至此，湯壽潛在「秋案」問題上蒙冤八十多年始得洗雪。

對秋瑾生平各種具體史事的論證，除以上提到的這些問題之外，還有：秋瑾的出生地，秋瑾祖父何時由閩回浙，秋瑾有否到過台灣，秋瑾之夫王子芳的人品，如何看待王秋婚姻，秋瑾由日本回國後在浙江湖州潯溪女校執教的時間，秋瑾是否在紹興明道女學執教過，秋瑾在獲悉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後是否應當立即在紹興發難，等等各種問題，除個別問題外，亦已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認識。

從以上綜述可以看到：40多年來，中國大陸學術界對秋瑾各個方面的研究全面展開，在極大多數問題上取得了共識。但這並非說已研究得差不多了，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。且不說其生平各種具體史事還會有新的問題出來，即就其一生三個主要業績而論，也仍有不少方面要深入研究，諸如秋瑾愛國思想的豐富內涵尚挖掘不深；秋瑾的革命堅定性令人敬佩，而其革命的策略性則是否不足？秋瑾在爭女權方面提出了許多十分先進的思想，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，在中國近代她無疑是女權運動的傑出先驅，那麼在世界女權史上她的地位如何？在詩詞創作上，她留世的一百多首詩、詞、歌、聯，大都很難判定創作的年月、地點，雖已有人花了很多力氣在認真考證，但要完成這一任務決非短期能成。諸如此類，都有待於深入研究。